

儒家等级观与当代社会^{*}

□ 周桂钿

摘要:讲平等以后,等级观念长期以来受到反复批判。从儒家对等级的论述来看,等级制有合理性的一面,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平等都是相对的,从未存在过绝对的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没有差别。财富不平均,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平均主义更不合理,差异才可能公平。平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现代社会的使命在于努力减少与减轻不平等。

关键词:儒家 等级制 平等 平均主义 调均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8)01-017-04

西方传入平等口号以后,中国就开始批评儒家的等级观念。等级观念成为十恶不赦的邪念,人人得以共讨之。讨伐一百年后,我们再看看平等源头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等级现象。只是划分等级的标准改变了。儒家的等级观都有些什么内容?在当时有没有合理性?对于当今社会还有没有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西方所谓平等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讲平等,平等与等级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平等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一、社会等级是客观的需要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从奴隶制以后,经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级从未消失过。等级区分在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都不一样,分别的标准不同,名称有差别,级差大小也不一致。差别是一样存在的。就中国而言,不同时期的等级是不相同的。在尧舜禹时代,尧舜禹是天子,其他则是臣民,因为记载资料缺少,难知详情。夏商周三代,商有甲骨文,周有金文,再加上《尚书》的一些内容,可以互相参考。周代的制度,人分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王最高,即天子;其次是公,诸侯如齐桓公;第三是大夫,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各种官员;第四等是士,这是特殊的阶级,相当于自由民,多数人是文文化的,有的还有特殊本事,能够出谋划策,带兵打仗,奔走于各诸侯之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分十等,爵位则分五等:公、侯、伯、子、男。爵位是天子封的,因此天子不在爵位内。最高的则是

公。以下是侯等。他们的区别首先是地方的大小: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三十里。在其他方面按礼的规定都有等级区别,天子用八佾舞,诸侯王(公)用六佾舞。公如果用八佾舞,就是僭越,违背礼的制度。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官阶也有许多不同。一般有卿、大夫。六卿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大夫则有上大夫和下大夫的分别。汉代又有中大夫。汉代有三公九卿的官职,隋唐以后则有五府六部体制。有的则按品级有一品大员,也有七品芝麻官。官级是一种等级,一般人群的等级则另有一套。秦朝建立郡县制以后,中央朝廷有相国(宰相、丞相)、公卿等官职,地方行政长官则有郡太守、县令(长)以及基层的三老等。

社会等级从来就有,但是,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商汤的后代成为商朝的统治者,而到了殷纣王就因为失去民心,周武王革命推翻了他的统治,“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荀子吸收了墨家的“尚贤”思想。墨子说:“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贤不肖作为唯一的选拔标准,贤者提拔,不肖者废除。这样一来,庶人与贵族之间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特别是隋唐时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通过

* 作者简介: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考试,选拔官吏,改变了世卿世禄的传统,上下层之间交流现象更加明显,势族衰落,下降为平民,少数平民通过考试中举,升入士族。势族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不刻苦学习,贪图享受,多数破落,所谓“富不过三代”。居于下层的平民子弟,苦苦挣扎,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向上冲刺,每有中层者进入上层,下层者进入中层或上层。这种人才交流,增加了社会的活力,缓和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巩固了社会的稳定。过去批评科举制度,就没有认识到它的长处。另一长处,就是确立了文官制度。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有文化,受到儒家伦理的熏陶,又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又有许多从平民出身,在行政中有一定的好处。比较西方一些贵族统治,有明显优越性。但这也并没有改变社会的等级现象。在阶级社会中,等级是消灭不了的。协调等级之间的关系,缓和矛盾,维持平衡,构建和谐,则是社会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做到和谐?儒家想了很多办法,可供参考。

二、儒家社会等级观

等级既然是客观存在的,消灭不了的,那么,如何正视等级问题,则是明智的选拔。多次农民起义都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实际都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把这个口号忘掉了。奴才当了主子,也不会取消奴才称呼。这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即使个别人改了,也无法改变社会需要的现实。适当的做法,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等级差别。

儒家认识与对待等级差别有以下一些观点:

首先,儒家认为等级差别是社会所必须。如荀子说:“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名分一样就无法普及。势位没有高低就不能统一。大家平等就没法指挥。两个一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候。两个一样低贱的人,不能互相使唤。这是客观定数。势位一样,好恶也一样,那么物质供应不上,就必然要争,争起来必然要乱,乱就会导致全社会的灾难。先王厌恶这种灾难,所以制订礼义等级制度来分别人群,使人群有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能够互相统管。这是养天下的根本。等级是当时社会所需要,没有等级,天下就会大乱,谁也别想过安定的日子。《尚书》中有“维齐非齐”的说法,只有不平等,才是公平合理的。墨子的“尚贤”主张,肯定机会平等,贤者上,不贤者下,最后结果也是不平等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

上》)物的价值可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千万倍。人也不例外,价值也有若干倍之差。勉强把差别拉平,必然要乱天下,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荀子认为人能够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组织起来叫“群”。能“群”在于“分”即名分、等级制度。“分”要合理,即义。合理的等级才能达到和谐,和谐才能统一,统一力量就大,力量强大,才能战胜自然物。人类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由于人有合理的等级差别“义”。(《王制》)

其次,儒家认为等级分配才是合理的。荀子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的共同欲望。如果随人所欲,那么“执不能容,物不能贍”,实际上不容许,物质也供不上,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先王制订礼义来分配财物,使“贵贱有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惠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贵贱、长幼、知愚、能不能,都根据他们所做的事以及做得好坏来进行相应的分配,这是“群居和一”之道。群居就是团体。和一就是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分配有差别,才能和谐共处。“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同上)当帝王的不感觉自己财富多,做下等杂役如守门、打更、旅馆服务的人员也不感觉自己收入太少。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与报酬是相应的。这叫“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同上)不齐才是齐的,不直才是顺的,不同才是合理的。这里包含深刻的辩证法道理。

第三,儒家认为在贫富之间必须调均。儒家承认等级差别,否认平均主义。同时,儒家又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过去许多人以为平均才是最合理的,结果,干活多少好坏都一样,干与不干也一样,使许多人都变成懒汉。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个“均”不是平均主义,是合理均衡的意思。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调均”,损有余而益不足。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贫富两极分化,太富与太穷,都会妨碍社会的安定。社会就不安定,就不好治理。我们现在的世界也像董仲舒所讲的那样,弄得很乱,不好治理。一边富者搞霸权主义,一边贫者被迫搞恐怖主义。天下就不太平了,人民生活也就不安全了。人的地位不同,享受物质可以不同,差别不宜太大。能力大小可以相差几百倍,但是,收入不应该差太多。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办法向高收入者多征收税款,用于公共事业和救济贫民。或者由高收入者以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形式进行调节。总之,董仲舒提倡的“调均”是很有意义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第四,儒家反对政府官员与民争利。调均的对立面是扩

大贫富差别。扩大贫富差别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有厚禄的官员贪污受贿,获得不义之财。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民愤最大的。儒家讲义利之辨,主张重义轻利。利就是物质财富,引申为一切利益(包括名誉地位等)。义是合理分配。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到利益,首先要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就可以取。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不是你的,你拿走,就是不义。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就是不义之财。孔子认为义非常重要,是政治的重要内容。二是职能部门以权谋私,通过权力垄断行业,谋取不当利益。职能部门出台一些政策,例如管水的规定水价,管电的电费提价,管通讯的通讯资费涨价,管房地产的提高房价,什么“电老虎”,“铁老大”,都是这一类问题。管钱的银行,职工工资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三是通过各种手段与民争利。董仲舒反对当官的搞副业创收,反对与民争利。他提倡以公仪休为榜样。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有些人把好处都往自己口袋里捞,“能者多劳”变成了“能者多捞”,千方百计与民争利,有的以权谋私,搞行业垄断,破坏社会公平。有人给公仪休送鱼,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可以用自己俸禄买鱼吃。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懂得珍爱自己。当今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高官,怎么不珍惜自己吗?奋斗一生,最后身败名裂,还要在监狱里苦度晚年。

第五,儒家主张用礼义调节,达到和谐为原则。在物质分配上,儒家认为必须有差别,差别要在礼义的范围之内。扩大差别和取消差别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异说同错。礼是等级制度,它首先是限制诸侯僭越行为。如果没有限制,诸侯就会由于讲排场,一些消费规格超过天子,例如天子用八佾舞,诸侯也用,就是僭越。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天下就会乱了秩序。他们争相僭越,就会无限制地增加人民的负担,导致物质贫乏与精神混乱。义指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当政者对待人民方面,例如税收多少,徭役多少,何时收取,何时服役,这些对人民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儒家一再提出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收成时收取赋税,农闲时使用民力,这都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保证农业生产,才能保证粮食供应,才能稳定社会。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国以民

为本。当官的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就是义。孔子讲子产“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使用民力符合义的原则。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即制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孔子认为夏礼到了殷代有了改革,殷礼到了周代又有所改革,以后还会不断地进行改革,这说明社会在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礼还要随着改革,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

第六,独立人格的平等精神。儒家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是客观需要,但在精神上却是应该有独立人格的。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

第七,大同理想。儒家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得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所谓大道,就是儒家讲的仁道或王道。天下为公,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全天下的人都为了社会公共事业作贡献。出于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什么都出以公心,那么就会选择贤人推举有能力的人去做适当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都要讲信用,大家都要维护和睦的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每个人不仅与自己的亲戚亲近,也不仅疼爱自己的子女,与社会所有成员都非常亲热。使社会每一个老人都能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寿终而死。使所有壮年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实现他的价值。每个小孩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教育培养,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者,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群体,是社会上最困难最悲惨的一部分人。大同社会对于这样一批人也要给予赡养,不使他们受冻挨饿。男有分,女有归。分指名分,即职业或职位。归,指归宿,妇女有婆家,有丈夫,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货指生产品,反对抛弃于地,就是反对浪费。不必藏于己,说明不是私有制社会。力指出力的事,就怕不是自身去做,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这种说法,说明当时的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劳动者的第一需要。大家抢着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既然大家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什么阴谋也不用了,盗窃乱贼也就全都没有了,住宅的外面的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大同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的实现,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但它在过去的社会中曾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开明、进步。它给人类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不断地减少乃至消灭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其中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用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解放全

人类。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很相似。差别在于:儒家没有说明这种理想的大同世界是怎样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极端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逐渐消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等三大差别。从而建立无阶级、无剥削、无战争的三无世界。这个世界与儒家所讲的大同世界极其相似。马克思与孔子相隔千年,相距万里,提出的最高理想却是极其相似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比尔·盖茨 2007 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那些科学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最后他说:“我希望,30 年后你们再回到哈佛,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更要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相干的人们。你们与他们的共同使命,都是同一个人类。”(引自《中外管理》2007 年第 10 期 P48-49)一个世界首富认识到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不平等,而且以减少不平等作为自己的平生志愿,自觉地为解决这个问题不遗余力地实践着。善待那些与自己远隔千山万水、毫不相干的人们,表达的思想与儒家仁爱思想完全一致。

三、简议平等观

平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理念。但是不平等却是普遍现象。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只有局部的、小范围内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对平等,从来没有大范围的全面的绝对的平等。不平等的内容与形式,不平等的标准与内涵,都在变化中。中国在周代的封建制中,诸侯爵位与封地是可以继承的,这叫袭封。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封建制改为郡县制,郡县的行政长官太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派遣,他们的子孙都没有继承权。只有皇位是世袭的。从周朝制度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平等的因素是非常罕有的。有一点值得注意,士这一阶层在社会上可以自由发言,这种发言权是平等的,因此才有当时的百家争鸣。讲的有道理,信众可能就会多一些,讲的道理不充分,得不到群众的认可,信徒就少一些。在春秋后期,儒墨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成为当时的显学。战国中期,墨家与法家十分流行,不

信利他的墨家,就信利己的法家,天下之言论不归法则归墨。秦统一天下以后,尊崇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于百家书,特别是儒家的经典,就采取禁止措施。这时代,言论就没有自由。百家失去了平等的发言权。“焚书坑儒”说明对儒家的压迫更加厉害。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有了最高的发言权,而其他各家就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这时代,各家的发言权也不是平等的。从汉朝以后,言论平等就很罕见了。虽然在混乱的时候,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各朝各代思想家都发表了各种言论,撰写了各种著作,各代又都有文人对这些流传下来的著作进行整理,选择、修订、重编、再版。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整理下来,各种著作自然也就在不断的淘汰之中。只有能说服历代文人的著作才能一再重刊,数千年一直保存下来。能保留一千年以上的著作,没有合理性,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平等,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提出挑战。它反对的正是封建世袭制度。那是一次大的进步。但是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就更加突出了。现在那些民主国家,对于平民来说,平等,那就是在数年一次投票选举总统时表现出来的一人一票是平等,除此之外,可以谈得上平等的也不多。受教育平等权利也非常重要,有钱人就选择条件好的学校。虽说这也是平等的,但在财富不平均的情况下也就不平等了。所谓政治平等,也是用财富来制约权力,来确定政治权力的,来产生言语影响力的。实际上,是用财富的不平等取代族群的不平等。许多人以为平等就怎么好,也不要太迷信了,最讲平等的国家,深入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平等的。入侵者的士兵与奴役国的平民能有平等吗?老板与雇员能平等吗?当然,我们应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在保护平民方面制订了很多法律,有钱人不能随便杀害穷人。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到了社会主义,也一时不能消灭这种差距,只有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会在财富上也有平等,那时可能又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差异是绝对的。从人类史来看,不平等逐渐减少,减轻,这就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发达国家如果能在在这方面做出表率,那世界甚幸!从中国历史来看,不平等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逼民造反,导致改朝换代。从人类历史来看,不平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就是人类的文明进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不平等现象的扩大,都是社会的倒退。退到一定阶段,不平等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这个王朝就要灭亡。平等是人类共同理想,共同追求。

责任编辑:戴树源